

邓小平南巡谈话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

——纪念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十周年

刘德军

[摘要] 邓小平南巡谈话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和最终形成的标志,也是一种理论信念体系。它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品格和魅力,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确定了当代方位、理论原则和途径,提供了崭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实践证明:邓小平南巡谈话厚重的理论底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精神支柱,并与历史同辉。

[关键词] 邓小平; 南巡谈话; 民族凝聚力; 发展; 精神支柱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02]01-0011-07

刘德军,山东轻工业学院社科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山东 济南 250100

一个伟大的事业,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思维;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必然有内在聚合的属于自己的精神支柱。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产生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我国思想理论界将其誉为:“理论丰碑”、“指路明灯”、“思想武器”、“政治宣言书”等,这是颇有见地的时代价值定位。本文仅从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角度,对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时代价值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邓小平南巡谈话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当代方位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可以从历史层面、文化心态层面、理性层面、内容层面等诸方面来理解。从理性层面上说,它是团结、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所显示的是民族的生命力、创新力和独立自主力^①。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刻的一次关键性谈话、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它以丰厚的理论底蕴使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和最终完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南巡谈话也是一种理论信念体系,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关于真理、真理方式和阐释价值目标的理论信念体系。它顺应时代,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等一系列根本的现实问题,进而确立了中华民族凝聚

力发展的当代方位。

(一)在旗帜鲜明地回答现实问题中确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走向

任何新的理论的创立,都是与一定的时代的实际紧密结合的。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最大特色,是紧扣时代脉搏,从实际出发,抓住根本,旗帜鲜明地回答现实问题,以确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走向。

其一,从国际形势来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冷战已经结束,世界格局向多极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经济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着眼于提高以经济和科技水平为标志的综合国力。中国要成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员,关键要靠中国自己的发展。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要回答的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

其二,从国内形势来看。经济上,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经济秩序明显好转,但发展速度低缓,甚至发生萎缩现象。政治上,1989年政治风波刚刚平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没有得到彻底清理,社会不稳定现象依然存在。有些人甚至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怀疑,“左”的东西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障碍。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要回答的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的问题。

其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状看。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沉滓泛起,社会主义命运遇到严重挑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

20世纪以来的最低潮。面对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出现的严重曲折,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庄严宣告:“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邓小平南巡谈话所要解决的是:中国如何使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的问题。

总之,邓小平南巡谈话,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总结历史,又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廓清理论是非、回答现实问题中,特别清晰地确立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当代方位,并使邓小平理论达到了最高层次。

(二) 在创新理论中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有长远的战略性的实际问题

作为战略家,邓小平观察、分析、回答问题,总是从长远利益出发,从大局上把握,处理问题举重若轻。通观邓小平南巡谈话,其所论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带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和指导意义。

首先,从宏观上看,邓小平南巡谈话,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南巡谈话由政治路线论、改革开放论、经济发展论、精神文明论、党的建设论、国际环境论等六大部分,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的思想体系和核心内容。其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满怀信心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③。

其次,邓小平南巡谈话回答的是当时党和国家必须重点解决的带有长远意义的现实问题。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怎样看待党的基本路线,怎样判断姓“资”姓“社”,怎样理解社会主义本质,怎样选择经济体制,怎样处理两个文明的关系,怎样加强党的建设等问题。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十四年的实践经验,以战略家的睿智眼光,对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科学地提出了:“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观点;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本质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市场经济论;“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关键在

党”的论断等。这些论断,不是泛泛地谈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而是有针对性地发表的极为重要的思想;它也不是仅从某个方面提出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而且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中的政策的变与不变、进与退等一系列问题所作的全面论述,从而澄清了长期困惑人们的许多认识问题,排除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许多阻力,强化了民族的凝聚力。

再次,从微观上看,邓小平南巡谈话中讲的许多看似很小的具体问题,他分析起来却意义深远。如,关于安徽的“傻子瓜子”问题,他指出:此问题,“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④;如,关于证券股票问题,他指出:“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进而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⑤;再如,关于学马列问题,他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灭”,“学马列要精,要管用”^⑥。以上所列,虽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中所体现的战略性的几个特点,但却是以理论为支撑的政治信仰、政治信念、政治目标。它反映了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政治制度以及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理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地位和深远影响。因此,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的悼词》中把邓小平南巡讲话同党的十四大并列,称“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当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⑦

总之,邓小平南巡谈话,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的关键时期,回答现实问题,针对性强,抓大局重根本;创造理论,底蕴厚重;带有长远的战略性。这样,就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确立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现代方位,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聚合、发展的坚实而长久的理论支撑点。

二、邓小平南巡谈话与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理论原则和途径

中华民族凝聚力既是一个包括吸引力、向心力、亲和力三种力量有机统一的合力,又是一个客观的动态系统。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不仅要遵循其独有的发展规律,而且必须要通过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原则和途径来规范国家、民族与社会成员所承

担的责任,进而把各族人民的意愿集中起来,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同心同德去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南巡谈话,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蕴含着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它通过这种有机组成的理念,直接为我们提供行动指南,并以国家政权机关保证其发挥辐射作用,从而进一步从整体上强化了各族人民的聚合力量。这些理论原则主要是:

(一)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原则。它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发展,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和发展动力。

在南巡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扩展和深化了他十多年来一再反复强调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④。在这里,邓小平所讲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指的是从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即从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意义上而言的。而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指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还突出地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并作了精辟独到的阐发。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⑤这无疑也在本质问题上解决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怎样巩固和发展的问題,也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找到了新的凝聚点。

(二)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原则。它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保证。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提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不是随意之谈,而是科学总结建国几十年实践经验而升华形成的系统的理论认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纲领。

首先,它是我们的理论纲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十四大、十五大所阐发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逻辑展开。它既立于中国国情,又具有开放性特征,并以发展现代化生产为中心,把富强、文明、民主融为一体。这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念、新理论。

其次,它是我们的政治纲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我们巩固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坚实深厚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我们强国之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显示出其优越性,越来越增强它的说服力、吸引力,我们就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它是我们的行动纲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明了三条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实现途径:一是通过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的途径;二是通过改革开放,实现机制转换,搞活社会主义的途径;三是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发展社会主义的途径。这三条途径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总之,邓小平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原则,就是竖管上百年,横管各方面。它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光辉旗帜,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得以巩固、发展的政治思想保障。

(三)关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原则。它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针、物质保障与精神动力。

坚持两手抓,是邓小平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反复强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方针。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他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⑥这是巩固和发展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需要。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实践,人们普遍体会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不仅包括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也包括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方面的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只有在创造丰富的物质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创造文明、安定的文化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明确地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⑦否则,人民群众不满意。在他看来,

“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⑧他特别强调:坚持两手抓,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局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⑨

(四)关于“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的理论原则。它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选什么样的人接班呢?邓小平提出了三条:一“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二“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三“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⑩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强调组织路线的重要性,用他的话直接地说就是:“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⑪正是在邓小平这一指示下,我们党成功地召开了十四大,完成了新老交替的历史任务,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理论原则。它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鲜明地提出了反“左”的问题。围绕反“左”,他提出了三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观点:一是指出“左”是主要错误倾向。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⑫当改革过程中出现某些难以避免的问题时,有人从“左”的偏见出发,误认为这些问题是改革本身造成的,对改革产生怀疑动摇,“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⑬总之,“左”的东西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如不坚决打破,改革就迈不开新步子。二是指出“左”的严重危害。他严肃地说,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左”的东西葬送社会主义。三是分析“左”的思想根源。所谓“左”,主要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主观愿望超过客观现实。他强调,“‘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⑭“左”作为是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屡纠屡犯。因此,必须深挖“左”倾根源,提高防“左”的自觉性。

总之,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原则,不仅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以丰厚的理论底蕴提供着凝聚人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从人们的现实思想状况出发,以刚性的理论特质规范、强化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三、邓小平南巡谈话与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文化功能

邓小平南巡谈话,按其现实本性来说,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承载,是通过中华民族这一主体的实践而升华的理论。它不仅对民族凝聚力具有匡正和导向等作用,而且具有超越和彻底的本质。所谓超越性,是说它不受时空、民族类别的限制,既蕴含着过去的指向,即几千年来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淀,又蕴含着未来的指向,即在历史新阶段上不断创造、不断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所谓彻底性,是说它能够说服人,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即它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论建设的根本,抓住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本。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南巡谈话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强大的功能。

(一)巨大的号召力功能

邓小平南巡谈话,作为一种主体化了的理论信念体系,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成为唤起当代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号角。所谓中华民族“自我意识”,是指中华民族对自身不同于别的民族的地位与作用的一种认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中华民族的“自觉度”。这种潜藏在中华民族意识中的“自觉度”一经唤起,便会激励民族成员的精神,增强民族的自决断力,使民族成员的情感为之激动,意志为之坚强,信念为之坚定。事实上,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十年中,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排除万难,已经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并把这一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了21世纪。这就是邓小平南巡谈话所唤起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度”。

(二) 能动的理性功能

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是贯穿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一条红线,它深刻地揭示了谈话的真谛与理论价值。它要求,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这就与一切自我封闭的思想、理论和行为都格格不入。它使人们能够清醒地分辨出理论上是抱残守阙抑或前进进取;行动中是畏首畏尾抑或敢闯敢为;真理面前是奋不顾身抑或畏难退缩,从而使人们的认识得到升华,使真理不断得到发展。“三个有利于”标准,则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中强调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事物价值评价标准,也是明辨是非、统一思想的武器。它使人们在权衡行为的利害得失、应为或不应为、理性或非理性中,得到理论上的支撑,以平衡自身精神世界。也正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性功能,使人们排除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种种干扰,解除了头脑中的种种禁锢,也制止了姓“资”姓“社”问题的抽象争论,鼓励着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断开拓创新。

邓小平南巡谈话的这种能动的理性功能,就是对民族成员心理层面的激励、平衡与比较。人们在激励与比较中,参照不同系数,调节自己的意识和行为,其结果就使某些偏离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意识和行为受到抑止,使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和理性得到弘扬。

(三) 深刻的思想教育功能

邓小平南巡谈话,所展现的是活的马克思主义,通篇贯穿着透辟的辩证发展观点和辩证分析方法。它要求人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分析国情、世情,按辩证法办事,并以此设计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这就与一切形而上学的、静止的、无所作为的、狭隘的观点和行为格格不入。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分析了许多问题和事物的关系,如革命与改革、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先富与后富,“左”的东西与右的东西,搞好经济建设与搞好社会风气,加快速度与治理整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几百年与社会主义几十年,学马列与靠实践,等等。邓小平对这些事物及其关系的论述,其中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启发、教育人们:观察、分析事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同时,谈话对事物的分析不是静止的、孤立

的,而是从发展的观点,从实际出发进行论证,做到了有分析、有综合,实实在在,富有说服力。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政治认识水平,而且也是对人们进行极为有益的思想教育。

(四) 长久的精神支柱功能

邓小平南巡谈话,作为一种理论信念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精神支柱功能。它不仅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根据,也是当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

我们国家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发展、振兴,或遇到艰难险阻,都离不开精神支柱。邓小平南巡谈话就是这样的精神支柱。它使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人格修养,有了新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这样,在困难中就会有坚定的立场;在艰险中就会挺身而出,就会涌现出爱国热情、捍卫民族利益;在逆境中就会知难而进;在平凡工作中就会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精神支柱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一面伟大旗帜。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邓小平南巡谈话,以旗帜塑造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以旗帜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事业,必须高举着这面伟大的旗帜。因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能够把56个民族融合在一个大家庭内,使中华民族成为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

实际上,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支柱功能,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规律的反映,更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融合的根基与纽带。离开了这个根基与纽带,中华民族将成为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软弱无力,国家、民族的生存将受到威胁。这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支柱作用的生命力。

总之,邓小平南巡谈话是承载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又在当代中国实践中升华的科学理论。它不仅以民族共同价值观的民族精神匡正和导向着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而且以超越、彻底的理论本质塑造着、发展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着巨大的精神支柱作用。

四、邓小平南巡谈话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未来发展

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向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既有民族性的绵延,又有时代性的新验证。中华民族凝聚力向未来发展,时代性是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标

志。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它独有的创造力与巨大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未来的发展注入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与无限蓬勃的生机。

(一) 适应时代要求,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这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

机遇十分重要,时机宝贵,时机难得,时机易逝,机不可失,时不待我。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一项十分紧迫而又意义深远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南巡谈话中强调:必须发挥能动的主体意识,努力抓住机遇。不可丧失机遇,他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①,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样,就把我们全部思想和工作集中到了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上来,以迎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与挑战。

邓小平指出:“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②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的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③这就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中,珍惜机遇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发挥创造性,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变可能性为现实性;在行为方式上,主动提出举措,变被动为主动,抓住主要矛盾,促进事物的发展;在思维方式上,要不断解放思想,主动破除因循守旧意识和旧观点的束缚,坚持开拓进取,树立敢于创新的观念和前进的意识。

邓小平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④在他看来,“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⑤为什么发展才是硬道理呢?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来看,加速发展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重要保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必要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同时,加速经济发展,对我国还有特殊意义。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及其社会化程度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差距。特别同西欧、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相比,经

济上差距还很大,相对还较贫困,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我们国家能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尽快富起来。这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要搞清楚”的根本原因。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未来的发展空间里,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以巨大的凝聚力创造辉煌的未来。

(二) 要明确中华民族的基本凝聚点,把倾斜度放在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上

这是邓小平南巡活动中又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方针。

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全面推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根本目的,也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基本凝聚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未来发展,体现其民族性和时代性,必须紧紧围绕这个凝聚点,才能形成和表现出各民族的综合力量,才能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邓小平反复讲,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必须抓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如果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要发展经济,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⑥

然而,中华民族凝聚点,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又有其特定的倾斜度。这个倾斜度,作为凝聚点的支撑点,直接关系到凝聚点是否能有效地实践。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强调在当代中国,这个倾斜度便是发展中国的科技与教育,即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强大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中国要用高科技,“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⑦。另一方面,依靠科技教育,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

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④

在邓小平指示下,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整套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把发展科技教育摆在了首位。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正式提出中国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⑤。可以肯定地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必由之路。

(三)要坚定社会主义必定胜利的信念,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这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它为人们正确认识当代世界形势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也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人类社会是按照其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邓小平对此是坚信不移的。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⑥。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又告诉人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道路都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前进的,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比,其发展的道路显得更加复杂、更加曲折。邓小平对此也是极为清醒的。他说:“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现象。”^⑦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处于低潮时,不少人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程产生了种种困惑和疑虑。邓小平对此严肃地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

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⑧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小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正确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不仅体现了他尊重规律、尊重历史、相信人民的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且对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未来发展的内在源泉。

总之,邓小平南巡谈话,不仅以厚重的理论底蕴凝聚着新时代的整个中华民族,而且以巨大的生命力为未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它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方针、方向性的。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综上所述,邓小平南巡谈话是惊世之言,是在关键时刻敲定中华民族主旋律之言;它是理论丰碑,是一座铸造中华民族之魂的理论丰碑;它是思想武器,是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思想武器;它是指路明灯,是指引中华民族团结前进的指路明灯;它是宣言书,是宣告当代中华民族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言书。所有这一切,就是邓小平南巡谈话在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进程中的时代价值,它将与历史同辉。

①王克千等著:《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209页。

②④⑤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2-383、371、373、378、379、380-381、380、375、377、375、377、370-371、377-378、378、382-383、383、383页。

③汤应武著:《抉择—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428页。

⑦《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年第7期。

⑧刘德军等著:《走科教兴国之路》,济南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0-11页。

(责任编辑:武卫华)